

牛孺子革命当甘

毛泽民烈士传略

韶山毛泽东同志故居陈列馆

新疆大学宣传处翻印

甘 当 革 命 孺 子 牛

毛泽民烈士传略

新大宣传处翻印 7 一九七八年六月

韶山毛泽东同志旧居陈列馆

“披肝瀝胆写春秋，甘当革命孺子牛”，这是一位诗人对毛泽民烈士的两句颂歌，表达了人们对毛泽民烈士的敬仰。

毛泽民同志是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大弟弟，字润连。青年时代，就跟随毛主席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英勇斗争，他曾先后担任过安源工人消费合作社经理，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经理、苏维埃国家银行行长、红一方面军十五大队、长征先遣工作团负责人、中国工农民主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负责人等职。他一生为革命理财，积劳成疾，为筹措红军供给呕心瀝血。不管是在白区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或在红色根据地进行武装斗争，他都是一心为革命，不计名利，哪里需要就奔向哪里，勤勤恳恳，鞠躬尽瘁。在监狱里，他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坚贞不屈，有如岁寒松柏，愈加挺拔葱茏。最后，他英勇捐躯，血染天山，用自己的心血和生命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灿烂的篇章。

(一)

毛泽民同志生于一八九六年四月，少年时代是在韶山度过的。由于父亲患肺病，哥哥毛泽东同志和弟弟毛泽覃同志离家比较早，所以，他幼年时没读多少书，从小跟父亲务农，十多岁就学会了作田的全套工夫。

泽民劳力强，为人正直，办事能干，合大伴，爱热闹。插秧季节，他总是同大家换工，合伙插田，搞得热热闹闹。他非常同情贫苦农民，每年青黄不接时，地主不仅趁机抬高粮价，而且要斗、担出售，不零卖，贫困户买不起。泽民看在眼里，就到外面搞些米来，平价卖给贫苦农民，一升半升的都可以买，实在买不起，他就借给大家。乡亲们对此无不感激。

然而良心救不了社会。不管泽民怎样发狠和体贴穷乡亲，但由于反动派的腐败统治，经常兵荒马乱，人民生活越来越过不下去。泽民在家里撑持着生活的担子，尽量克勤克俭，勉强过日子，并且想方设法给在外的兄弟一些资助。

一九二〇年冬天，毛泽东同志从长沙回到韶山。一天晚上，全家坐在火炉旁，毛泽东同志对弟弟说：这几年我不在家，泽覃又在长沙读书，家里靠你一个人掌事，够你辛苦了。

泽民听哥哥这一提，长长地叹了口气说：家里那年起火后，第二年冬天修屋，以后又遭败兵抢了几次。加上母亲和父亲先后去世，这一来，家底搞光了，一年不如一年……

毛泽东同志听了弟弟的叙述，沉默了一会，便开导他说：你说的都是实际情况，这不仅是我们一家的事，国乱民

不安生嘛！……接着，他建议泽民把家里收拾一下，到长沙学习去。

泽民感到很突然，问：“那家里的田哪个作，屋哪个住？总得有个安排呀。”

毛泽东同志笑了笑：“这好办。”接着，便介绍了当时全国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形势，教育弟妹：我们要想到祖国的前途，民族的命运，人民的痛苦，要舍家为国，舍己为人民！

泽民听哥哥这一说，震动很大，韶山人民的生活为什么这般痛苦，为什么连年兵荒马乱，为什么家境越来越艰难？深深感到：世道不改变，个人再苦撑苦干也是空的。毅然决定离开家乡，跟哥哥学习革命去！

一九二一年春天，泽民带着简单的铺盖和换洗衣裳来到长沙。他先在一师附小搞校务，具体管理全校师生的伙食。在毛泽东同志的教育指点下，他处处为穷苦的青年着想。比如学生的膳费，原规定每期一次交清，穷学生一时缴不起，他便改为分期缴纳，解决了一些穷苦学生的困难。他还带头开荒，积极组织师生种菜，并亲自去湘乡、湘潭一带，采购肉食蔬菜，买回小猪，发动师生员工喂养，积极组织师生共桌开集体餐。这样不仅改善了学生的伙食，更重要的是有利于师生参加劳动，打成一片，对于改造思想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当时的学校能做到这样，确实是个了不起的事情。

一九二一年秋，毛泽东同志为了传播马列主义，发展党的组织，在长沙创办起湖南自修大学，并附设了补习学校。泽民就一面在自修大学搞庶务工作，一面参加补习学校学习。毛泽民同志在这里勤工俭学，经历了一年多的岁月。这一年多，是奠定他共产主义人生观的重要时期。他通过“自己看

书，自己思索”，结合当时的社会实际，“共同讨论，共同研究”，学到了马列主义的基本观点，澄清了自己过去很多模糊的认识。比如那时乡下为什么穷的穷，富的富？为什么兵荒马乱，世风很坏？听了毛泽东同志的讲课，他懂得了穷人为什么穷？不是他们“八字不好”，“命里注定”，而是因为工厂、土地不在穷人手里，年年受地主老财的压迫和剥削。富人为什么富？是因为他们占有工厂、土地等生产资料，能够侵占别人的劳动成果。要改变这种状况，靠个人拼命劳动，或敬佛行善都是无用的，必须不信天命干革命，把土地从地主老财的手里夺回来。而这种革命，只有在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的领导下，打倒了帝国主义和地主资产阶级后才能实现……

如果说毛泽民同志毅然离开家乡，走向社会，是他革命的起点，那末，这时他就迈入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崭新征程。一九二二年，经过毛泽东同志和党组织的考察培养，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二)

一九二二年，全国工人运动浪潮汹涌澎湃。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地工人罢工的斗争，如火山爆发，激浪滔天。毛泽东同志多次到安源发动和领导组织工人运动，一九二二年下半年，安源成了江南工人运动的中心。为了造就干部和加强党对工人运动的领导，这年年底，党和毛泽东同志派毛泽民同志去安源。

在罢工斗争的高潮中，毛泽民同志顶着风雪来到矿区。

在矿党组织的领导下，他积极投入斗争，与工人们一道，写标语，做横幅，搞调查，组织工人骨干开会。他常对工人们说：“我们工人要团结，要和反动军阀、资本家斗到底！对他们不要抱任何幻想，要时常提防他们要花招。”

开始，我党是以安源工人俱乐部这个群众组织来开展活动的，但由于开初对工人群众的生活注意不够，有的群众一度对加入俱乐部并不十分热心。当时工人不仅受德、日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家的重重压迫和剥削，而且还受奸商的盘剥，生活十分困苦。工人每月的生活费，常常连米都买不回，油盐酱菜更贵的吓人。毛泽东同志得知这个情况后，非常关心，指示俱乐部开办工人消费合作社，抵制奸商剥削，把广大工人进一步组织起来。于是，一九二三年二月七日在安源办起了中国第一个工人消费合作社。担任合作社经理的就有毛泽民同志。

俗话说，万事开头难。当时开办合作社是破天荒的事，实在不容易。泽民同志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处处相信依靠群众，大力宣传合作社的好处，没有经费，他通过俱乐部，动员群众，在工人自愿的原则下，每人出一元或五毛（角）钱做股本，很快筹齐了开办合作社的经费。货源不足，他根据群众的需要，派人直接到长沙、武汉成批购货，以减少商人的中间剥削。货物运回后，他带头装卸搬运，与工人一道，挑，拉，抬，扛，一面劳动，一面向工人宣传革命的道理。由于他这样埋头苦干，兢兢业业地为革命经商，为工人谋利益，合作社办的很兴旺。合作社出售的物品价格，比私商店子平均便宜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因此，每天安源镇老后街的消费合作社门前，热闹非常；而哄抬物价的私商店铺，却是冷火秋烟，十分萧条。奸商们对合作社恨之入骨，他们贼

眼一转，也到合作社来买东西，然后转手到外地卖高价。毛泽民同志对他们这一手早有提防，立即向俱乐部报告，提议凡是参加俱乐部的工人每人发一块牌子，凭牌买货。这样不仅堵死了奸商的捣鬼，并促进了合作社的发展。到一九二四年，由原来一个社，发展成一个总社，几个分社，南杂百货，样样齐全。从而加入工人俱乐部的人越来越多。有力地推动了路矿工人运动的发展。一九二三年“二·七”大罢工被反动军阀镇压后，全国工人运动出现了暂时的低潮，而安源的工人运动却方兴未艾，一浪高过一浪。这是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结果，也是与毛泽民同志的努力分不开的。

(三)

一九二四年深秋，正是岳麓枫红、层林尽染的时候，毛泽民同志因盲肠炎发作，离开安源到长沙住院。一九二五年初，他手术后伤口刚好，就随哥哥、嫂子带着岸英、岸青回到阔别四年的故乡——韶山，协助毛泽东同志发动群众，调查研究，进行访贫问苦，建立农民夜校。不久，党派他赴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

一九二五年冬，毛泽民同志抵达上海。当时党中央为了广泛宣传马列主义，统一领导全国发行党的刊物和内部读物工作，决定成立出版发行部，毛泽民同志担任出版发行部经理的职务，面对大革命运动迅速发展的大好形势，肩负宣传马列主义的光荣重任，毛泽民同志愉快地接受了这个任务，决心为传播无产阶级革命真理而倾注全力。

当时，我党设立了广州书店、长江书店（武汉）、南昌

书店、宁波书店，在法国巴黎和香港，也设立了书店和代办处。书的来源均由我党的“上海书店”供给。上海书店设立了几个印刷厂，专印马列著作、我党的内口文件和刊物。党中央的理论刊物《响导》、团中央的《中国青年》等，都是在这里印刷发行的。

毛泽民同志首先加强了对上海书店的领导。在内口进行了调整，分门别类地建立了发行系统。不到半年，书的印刷、销售量增长一倍多。到一九二六年，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书的销售量陡然猛增，印刷任务就更紧了。毛泽民同志为了充实印刷力量，做好发行工作，成天奔波，废寝忘食，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

由于党的秘密印刷厂缺乏装订设备，毛泽民同志利用资本家爱财如命的特点，找了一家小厂子代为装订，派人监督。那个资本家见钱眼开，表示只要定价从优，他是不问政治的。在革命形势下，那家伙确也遵守合同。到一九二七年春，上海反革命政变的风声越来越紧，那个资本家便妄图出卖毛泽民，从反动派那里捞一笔巨款，毛泽民同志对此也时刻保持警惕。一天，毛泽民同志去那个小厂检查装订工作，还未进门，老板就满脸堆笑地迎出来，把泽民同志请进自己的卧室。毛泽民同志以为老板有什么事要谈，而那家伙却东扯西拉，叫客人“稍歇，稍歇！”便借故出去了。毛泽民同志坐了片刻，见老板还未进来，便决计离去。拉门时，门果然被反扣上了，泽民同志当机立断，立即转身爬上窗口，跳楼而走。当他从后门奔出时，只听得无数脚步上楼的咚咚声，接着，是流氓对老板的叫骂声……

这件事不久，惨绝人寰的“四·一二”大屠杀发生了。上海顿时笼罩着血雨腥风。在这历史的严重关头，泽民同志

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立即乘长江的轮船，逆江而上，离开上海奔赴武汉。

当时在武汉的汪精卫还没撕下伪装，仍挂着“国民政府”的招牌。毛泽民同志抵武汉后，奉党中央的指示，担任“民国日报”的经理。不久，许克祥在长沙又制造屠杀共产党人的“马日事变”，武汉三镇更形紧张。七月十五日，汪精卫撕下伪装，公开叛变革命，大批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到了失败。

大革命失败后，党的“八·七”会议前夕，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毛泽民同志回到湖南进行秋收起义的准备。他化名周方，深入到湘潭、湘乡一带，进行组织工作。九月中旬回到长沙，得知毛泽东同志带领秋收起义部队正在向平浏一带直进。他费尽周折，仍未追上毛泽东同志带领的起义部队，便回到长沙继续坚持党的地下工作。直至这年冬，党中央来信，叫他仍返上海。毛泽民同志回到上海，发现党的秘密印刷厂虽已停顿，但还未被敌人发现，便决定继续开办，先印一般书籍。没过几天，一群流氓打手冲上门来。幸好这时党内刊物都已转移和烧毁，只剩下几册马列书籍。特务们发现后，要将泽民同志带走。毛泽民同志神态自若地说：“诸位，我是印刷厂的老板，只管做生意，分不清什么这个党那个党的。如果这样不明不白把我带走，造成厂子关门，工人们生活无着可不好办呀！”四周的工人们听后，立即奋起相助，流氓们见势不妙，头一歪说：“老子不能白跑一趟，跟我走！”管账的同志听后，忙拐了个弯笑道：“这个好说，好说！”打发了他们一笔款子，毛泽民同志得以脱险。但是自此以后，敌人的盯梢更紧了。

为了保护印刷厂和毛泽民同志，党组织决定，把厂子转

移到天津。毛泽民同志便在天津开办起“华新印刷厂”，楼下以出售发票、请柬之类的印刷品做掩护，楼上继续印刷党的内部读物、文件、传单，以及河北省委主办的《北方红旗》等刊物，有时还翻印些马列书籍。就这样在天津历尽艰辛地坚持了三年多，为传播革命火种不断做出了贡献。

一九三一年元月，毛泽民同志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再一次回到上海。这时上海大分党的组织遭到了严重破坏，到处是一片白色恐怖。毛泽民同志英勇机智，以开设“酒行”做掩护，为恢复党的秘密组织和重建印刷厂而日夜奔忙。

这时，他得到嫂嫂杨开慧同志已被何键杀害的消息，如同晴天霹雳，怎么也克制不了自己无比悲痛的情感。不久，岸英、岸青、岸龙三个孩子由舅妈从长沙护送到上海来了。泽民同志一见，止不住热泪夺眶而出。他坚定地对孩子的舅妈说：“请你不要过分伤心，搞革命，流血牺牲的事是经常发生的。蒋介石的屠刀吓不倒我们，最后胜利一定是我们的！”接着，他把孩子送到党在上海办的“大同幼儿园”，以后还经常去看望他们。不久，岸英上了学，能识字写信了。岸青、岸龙也在党的关怀下成长很快。毛泽民同志看到孩子们进步，感到无限的欣慰。

后来，上海党的组织又次一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为了防止敌人的大追捕，中央决定：毛泽民同志带几个人离开上海，去香港开辟工作。谁知刚登上香港的码头，又得到上级的指示：由于形势的变化，要他迅即离开这个地方。毛泽民同志毅然决定：离开香港，到苏区去！

(四)

“战地黄花分外香”，“风景这边独好”。一九三一年七月，毛泽民同志经过辗转曲折，来到闽粤赣红色革命根据地。

这时，我工农红军在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下，已胜利地粉碎了蒋介石的第二次“围剿”，工农武装和革命根据地迅速扩大。根据地跨闽粤赣三省，拥有三百万之众，并连成一片，正处于土地革命高潮之中。

一直在白区从事地下工作的毛泽民同志一到苏区，真象到达了另一个世界，精神分外振奋。他担任了闽粤赣军区的后勤部长，负责打通苏区与粤、赣的交通线，为部队解决给养问题。这项工作是很艰险的，但泽民同志没有考虑个人安危，愉快地接受了任务，继续出生入死地为革命理财，做好部队的后勤工作。

一九三一年九月，我苏区军民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又一次粉碎了蒋介石更大规模的第三次“围剿”，根据地有了更大的发展。这年十一月七日在瑞金叶坪，召开了全国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中华苏维埃临时政府，毛泽东同志当选为政府主席。一九三二年，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泽民同志主持筹备和成立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担任银行第一任行长。

这时，由于上海党的组织遭到严重的破坏，党中央由上海迁到了苏区。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者来到苏区后，疯狂地反对毛主席，对忠实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干部进行残酷的迫害和打击。毛泽民同志毫不考虑个人得失和安危，他坚信毛主席的路线是正确的，根本不理睬王明那一套，坚决执行毛

主席“统一财政，筹款支援前线”的指示。首先，狠抓了货币的统一。那时由于国民党的票子已在苏区禁止使用，通用的是银元，而当时红军财政困难很大，银元非常有限。为了解决三十万队伍的开支，把整个苏区的财政统一起来，毛泽民同志决定印发苏区自己的钞票。并规定：各队伍设立银行办事机构，随军作战，重要市镇派出工作组。每打完仗后，由银行办事机构负责收拾缴获的物品，开出收据。一元苏维埃的票子，可到我银行换一元二角现洋。这样很快提高了苏维埃货币的威信，不到两个月，至一九三二年年底，苏区就统一了货币和财政。正如当时苏区一位领导同志说的：“苏区财政的统一，是毛泽民同志的一大功劳。”

一九三三年十月，蒋介石调集一百万匪军、两百多架飞机，对我苏区发起空前规模的第五次反革命“围剿”，由于王明一伙推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使我党辛苦聚集的革命力量，遭受了惨重的损失。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红军被迫退出苏区，开始了震撼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长征开始时，毛泽民同志担任十五大队的负责人。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以后，他担任了先遣工作团的负责人。担负沿途筹款，供给全军的经费，搞好队伍后勤工作的任务。

长征途中，经过许多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国民党反动派长期的欺骗宣传，少数民族群众对红军不够了解，有的地方把粮食藏起来，连水磨、石臼都破坏了，群众纷纷躲进了深山。毛泽民同志要求战士们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以实际行动打开局面。有时找到一些谷子，也无法脱掉谷壳。毛泽民同志便动员大家用石头和手加工。他规定：炊事员不脱谷，运输人员只脱自己吃的那一份。干部除了脱够自

已吃的，还负责炊事员吃的那一份。长途行军的疲劳，使得大家一坐下就不想动，有的倒下就睡了。毛泽民同志便带头脱谷，一把一把地用手磨起来。手磨出了血，把谷米都染红了，他还在坚持。同志们看到这一情景，无不感动，顿时精神大振，欢快地干了起来。行军路上，□队每次宿营前，毛泽民同志总是先赶到前面去，与当地群众取得联系，了解当地情况，热情宣传我党我军的民族政策。□队进入宿营地后，他便向大家介绍当地风俗习惯、政治情况，要求大家模范执行党的民族政策。比如不准乱打枪，不准乱没收群众的东西，不准拉群众的牛羊，不准说少数民族群众是“蛮子”，要优待少数民族翻译，学少数民族的语言，象兄弟一样对待少数民族等等。有一次，□队打土豪时，错杀了老百姓的一头猪，毛泽民同志知道后，立即要□队照价赔偿，并亲自带着钱，去向老百姓道歉。那位老乡说什么也不肯要，还说：“你们为穷人拚死拚活，杀了头猪有什么关系，就算我家慰劳□队的一点心意啰！”毛泽民同志便反复向他宣传我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老乡才勉强收下，深为感动地说：“盘古开天地，还没有见过这样好的军队！”由于少数民族群众亲眼看到了红军纪律严明，处处爱护人民；亲耳听到了红军宣传“打土豪，分田地”，“北上抗日”、“各民族平等”的革命道理，因而对红军十分爱戴，纷纷把粮食、红糖、鸡蛋拿出来慰劳红军。还有不少贫苦青年踊跃参加红军。

毛泽民同志始终坚持“官兵一致”的原则，对战士无微不至的关怀。他有一匹马，自己却很少骑，经常让给伤病员或体弱的同志骑，有时就留给收容队用。他身体不好，但还经常帮助运输员挑担子、背东西。爬雪山时，他因担的担子

太重，累得吐血了。旁边的战士忙抢过他的担子，加到自己的肩上，泽民同志艰难地咳嗽了一阵，又顽强地站起来，提着扁担追上去，从战士肩上接回自己的担子，挑起又继续往前走，劝也劝不住。同志们感动得热泪盈眶，只得大步跟上去。毛泽民同志对炊事人员特别关心。行军中，炊事战士每人要多担几十斤重的炊具，路途休息时，要烧开水给大家喝；宿营时，要安锅灶、劈柴、洗菜、做饭，如果粮食困难，他们往往还要翻山越岭，赶到部队前面去找粮食。因此毛泽民同志特别规定：每十天让炊事战士休息一天，这一天由于轮流做饭，他自己带头实行。同志们见他工作忙，身体又不好，想叫他免了，他严肃而风趣地说：“你们能做，我怎么不能做，难道我就不吃饭了？”这制度从长征初开始，一直坚持到过草地。由于泽民同志这样关心和爱护同志，十五大队的全体炊事战士，都坚持胜利地到达了延安。

到达陕北后，毛泽民同志担任中国工农民主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陕北地广人稀，加之连年灾荒。红军的物资供应很困难。毛泽民同志为了保证部队的给养，不顾身患重病，经常亲自带着部队到新开辟的地区发动群众，筹粮筹款。一九三六年秋，各国工人阶级，为了支持我党我军抗战，筹集了一大笔款子，由法国寄到上海。党中央决定让毛泽民同志带几个同志去取回这笔款子。他接受任务后，便立即化装，经西安赴沪。到上海一了解，有几十万美元，并且都是外汇。当时上海还是一片白色恐怖，如一次将外汇换成国民党的法币，会被敌人发觉。毛泽民同志便决定：分批兑换，分批运走，分散行动。就这样持续到一九三七年初才兑运完。毛泽民同志是最后一批回来的。为使这笔款子顺利地 from 上海兑换出来，带回解放区，毛泽民同志花了大量的心血。由于毛

泽民同志长期积劳，加之这次劳苦奔波，身体越来越坏，长征路上得了的严重支气管炎这时又发作起来。从上海回到西安时，身体已经支持不住。经请示党中央，组织决定送他到苏联去养病。

（五）

一九三八年年初，祖国西北，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天山劲松却傲然挺拔，战风斗雪，郁郁葱葱。毛泽民同志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过完春节以后，立即乘飞机经兰州往新疆，准备经新疆再往苏联。毛泽民同志抵新疆后，在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暂歇。当时，正是芦沟桥事变后不久，在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下，在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感召下，全国燃起了抗日的烽火。新疆军阀盛世才看到新疆地处中苏边境，我党我军在那里的影响越来越大。为了巩固他那摇摇欲坠的统治地位，极力伪装对外亲苏，对内亲共，愿与我党合作抗日，并要求我党派干部到新疆去协助工作。我党为了利用盛世才与蒋介石之间狗咬狗的矛盾，团结新疆各族人民联合抗日，决定同他建立统一战线，并派了以中央委员陈潭秋同志为党代表的一百多名共产党员到新疆开辟工作。后来，中央让毛泽民同志也留在新疆，参加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的领导，与陈潭秋同志一道，坚持我党既联合又斗争的原则，开展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他化名周彬，担任新疆财政厅厅长。当时的新疆，财政极为混乱，官订，地主横征暴敛，贪污成风，伪币泛滥成灾，物价一日数涨。人民生活极其困苦。面对这个局面，毛泽民同志决定大力整顿新疆的财政，支持抗日战争，他针对盛世才的一套腐朽政治，拟订了一个发

展新疆经济建设的三年计划，提出了改革币制、禁止滥印钞票、建立金融制度等一系列措施。这个计划，对盛世才的挥霍浪费、滥用财政开支是个很大的打击。盛世才便想方设法企图停止三年计划的实施，并向财政厅索取全疆收入的绝大部分归他开支，以作为特务活动的经费。毛泽民同志对于盛世才这一阴谋，坚决抵制，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他严正地说：建设计划，既经讨论决定，必须执行。财金收支是有计划的，不能随便更改。盛世才当时尚未完全撕下进步的伪装，苦于无言对答，又气又恨，只好收回这一无理的要求。

毛泽民同志为了集中财力，把各企业机关的财政都尽可能统一起来，甚至连司法机关的赃物变价、粮务处的马尾和驼毛变价的款子，都由财政厅统一分配到各项建设事业上去。同时，他坚持金融法纪、追查贪污挥霍、堵塞当铺盘剥、广泛发行公债、对公务人员实行奖惩条例等。这样，仅一年多时间，就出现了全疆收支基本平衡，物价比较稳定，促进了生产的发展。象新疆独山子油矿、阿勒泰金矿、头坝河铁工厂，就是当年在毛泽民同志的直接关怀下开创起来的，受到了新疆各族人民的欢迎和拥护，有力地支援了抗日战争。

毛泽民同志在新疆工作四年多，条件极为艰难，斗争极其复杂，但他象挺拔的劲松，不畏艰险，宁折不弯，充分表现了一个伟大共产主义战士的英雄气概。这时他的身体更加差了，每逢阴雨天，伤口就红肿发痛，特别是当支气管炎发作时，常咳不止，震得伤口更加剧痛。但他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用绑带把肚子紧紧捆住，坚持工作。有时咳嗽咳得吐出口口鲜血，仍不离开工作岗位。有一次昏厥过去了，同志们

把他送回家，他一醒来，又挣扎着坐起，继续批阅文件。他多次深沉地对大家说：我到新疆来，就是要为新疆各族人民多做一些工作，这是我最大的愉快。人民的事业，每一件都有时间性，不能因为个人身体不好而受到延误。公务人员听了深为感动。毛泽民同志虽然身为厅长，在生活上却从不搞特殊要求，始终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作风。他不抽烟，也不喝酒，每月的薪金，绝大部分交作党费。他戴的一顶旧皮帽，从内地戴到新疆，一直到入狱、就义。一双旧毡筒他穿了好几年，大家劝他该换双新的了。他总是摇摇头笑道：这不是很好吗，能穿就行！他经常动员大家：为了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争取中华民族的解放，前方将士浴血疆场，我们在后方过着安静的生活，不能高枕无忧，应该节衣缩食，全力支援抗日前线！他对自己是这样克勤克俭，严格要求，而对同志、对新疆各族人民，则总是热情关心、体贴入微。每当夜间办公时，他就对守候在办公室的司机和服务人员说：“你们休息去吧，我这里没事了。”可是，司机和服务人员走后，他还在埋头工作。有时大家睡过一觉了，办公室的窗口还亮着灯，不时传来他艰难的咳嗽声。有一次，昌吉县城发生大火，他知道后，第二天天未亮就赶到现场，当时县里的公职人员还未起床。他派人把大家叫起来，亲自组织指挥安葬死者、护送伤员的工作，一直到救灾工作安排落实后，才离开现场。一九二四年夏天，在他担任新疆民政厅厅长期间，恶性鼠疫、斑疹在新疆西部流行，死亡率很高。毛泽民同志知道后，立即组织医疗队奔赴疫区，并不顾自己病重，亲自到疫区的几个县来回奔波，指导和检查防治工作。由于操劳过度，引起血压上升，心脏绞痛，支气管炎又发作，大家把他送回乌鲁木齐医院。他身在医院，心还在疫区，挣扎着从床上爬起来，